

徐時霖整理出版祖父徐鑄成手稿

從報人視角領略真實歷史



◆1949年10月，徐鑄成參加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時與其他代表合影。



◆1954年8月，徐鑄成參加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

香港《文匯報》主要創辦人、著名報人徐鑄成生於1907年，不到20歲就開始做記者，至1991年去世時，從事新聞工作有60多年。徐鑄成在幾十年的新聞工作生涯中，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今年，由徐鑄成嫡孫徐時霖整理的《徐鑄成日記（1947-1957）》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呈現1947至1957年間，徐鑄成有關解放戰爭、開國大典、朝鮮戰場、一屆人大、蘇聯之行等磅礴歷史的見聞與思考。閱讀這卷鮮活細膩的日記，如見一部重要的個人史、報史和新聞史的重要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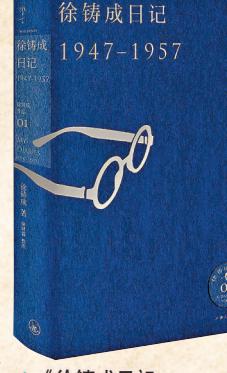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徐鑄成日記（1947-1957）》根據徐鑄成的手稿首次整理出版。徐時霖對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道，在祖父去世後，家人着手整理推進出版他的遺作《徐鑄成回憶錄》。1997年，當時三聯書店的總編輯董秀玉在編輯審稿過程中，看到回憶錄書稿中大量地引用了日記，於是提議整理出版這部日記。祖父在幾十年的新聞工作生涯中，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但由於生活艱鉅和工作繁忙，他的日記時斷時續，初步查閱，現在遺存的部分約有70萬字。這卷在內地新出版的日記，從徐鑄成現存的日記中選取了1947年、1949年、1951年、1954年、1957年這五個片段，分別記述了作者擔任上海《文匯報》主筆、作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候補代表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赴朝鮮慰問志願軍、參加第一次全國人大會議、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團長訪問蘇聯期間的主要經歷，並依據徐鑄成筆記檔案和相關史料做了大量豐富詳細的註釋。

凡有疑問即有交代

「作為新聞工作者，祖父親歷和見證了中國現代史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他的日記和採訪筆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也是真實的歷史紀錄，反映了一代報人和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徐時霖說，不過由於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特點，祖父的日記常常是日記和工作筆記、採訪紀錄和個人的日常事務相混雜，需要認真鑑別和整理。同時大量的文字使用連筆和速記符號，識別也需要花費很大功夫。

在徐鑄成日記的特約編輯李志卿和項瑋看來，日記作為一種私密文本，具有非公開寫作的性質，因此會有很多只有作者自己才能解密的內容。編校過程中，最困難的是需要核對作者特殊時期的日記手稿，比如朝鮮戰爭時期的戰地日記，當時不可能有伏案寫作的環境，很多時候只能窩在角落或顛簸的汽車上記下幾筆，或者在志願軍代表做戰地報告時速記，有些記號性的文字、圖案無法辨認，結構也比較紛亂。值得一提的是，日記裏有很多人物、事件、地點等信息，有些對於新時代的讀者或有些陌生，需要相應的「解讀」才能了解。徐時霖為此專門學習了有關日記整理校勘的知識和學術規範，並閱讀徐鑄成先後工作過的《大公報》和上海、香港《文匯報》歷史，為日記出版做了大量註釋，盡量做到「凡有疑問即有交代」。他還把日記原件借給出版社對照辨認，對結構混亂的



◆《徐鑄成日記（1947-1957）》



◆1938年，徐鑄成在上海《文匯報》時期。
◆1948年，徐鑄成在香港《文匯報》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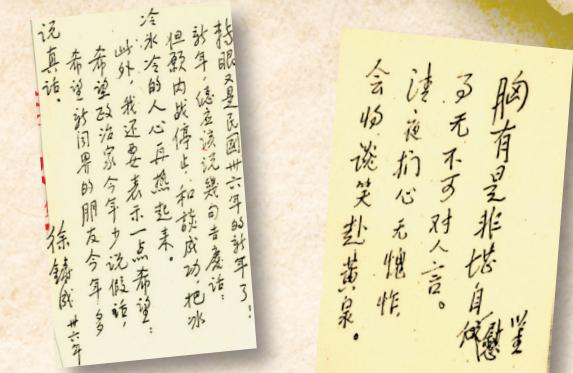
地方反覆討論，盡可能理解作者的意圖，呈現當時的原貌。

常夢伏案荷李活道斗室寫社論

徐鑄成參加《文匯報》的經歷，主要有五個時間段：一是1938年2月至1939年5月的上海《文匯報》，二是1946年3月至1947年5月的上海《文匯報》，三是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的香港《文匯報》，四是1949年5月到1956年3月的上海《文匯報》，五是1956年10月到1957年7月的上海《文匯報》。「五次任職，五次中止，五個斷續的短暫時期，使他走上了報人生涯的巔峰。」徐時霖評價，其中，在香港《文匯報》是徐鑄成最緊張、最有挑戰性的一段。但是，在祖父遺留的日記中，沒有發現1948年有關香港《文匯報》籌劃創辦的部分，「是沒有寫，還是以後遺失了，原因不詳。」

徐鑄成在香港《文匯報》工作期間的同事，徐時霖小時候在上海見過的有欽本立、柯靈、唐海、梅朵、崔景泰、陳欽源、黃立文、姚芳藻、戚家柱、任嘉堯等前輩，他們都是當時的知名編輯記者和報業管理人員。「當時創業的前輩，還有馬季良、胡星原、孟秋江、金慎夫、梁純夫、陳朗、劉火子、溫崇實、鄭拾風、方亢、石方禹、蔣文傑、米谷、唐君放、王思囉等，還有浦熙修等在上海南京的『地下』記者。」徐時霖說，他工作以後又認識了詩人公劉、經濟學家楊培新等，他們都是當時香港《文匯報》的骨幹。

徐時霖還介紹了一個細節，祖父在1980年到訪香港《文匯報》，交流時，他將上海《文匯報》和香港《文匯報》比作「兩個兄弟」，只不過香港《文匯報》在香港「懷孕分娩」，半年後就交給別的同事撫養，而離別30年，祖父總是想念她：「有時，常常在夢中伏案荷李活道的斗室中發稿子、寫社論。」



◆1947年，徐鑄成當年的《文匯日記》題詞。

◆1986年，徐鑄成寫完回憶錄後的自題詩作。



報紙需做讀者

「友直，友諒，友多聞」的益友

「報人」的稱謂，是徐鑄成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他自己非常珍重這一稱呼。作為一位從事新聞工作60多年的老報人，徐鑄成的探訪經歷豐富，著作等身，《新聞藝術》是其中一部較為完整地闡述其新聞思想、新聞學術觀點和結合新聞實踐經驗的著作。今年5月，知名的「大家小書」系列叢書將《新聞藝術》納入其中出版，是該叢書新聞學系列的第一種，詳細介紹徐鑄成的辦報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看《新聞藝術》發現，徐鑄成強調較多的就是報紙要做讀者「友直，友諒，友多聞」的益友。其中，「友直」指是



非清楚、明確，對於社會上的不良現象，或者是經濟犯罪，倚仗特權，以勢壓人等等，敢於揭發；對錯謬的事情能直言；「友諒」指報紙能經常了解讀者的處境、苦悶、願望以及接受水平等，使讀者和報紙心連心，願意向報紙傾訴；「友多聞」指經常調查研究，了解本地、本省、全國和國際的形勢和情況，通過報紙向讀者無話不談，知無不言。通過踐行上述理念，做讀者的「益者三友」。

徐鑄成還鼓勵新聞記者，應該多看書，積累廣博知識，從古到今，從自然科學到應用科學、社會科學，特別是中外歷史、中外地理、法律、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都應該一般地比讀者有比較深廣的常識，不講外行話。同時，多背誦一些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名篇佳作、名句警語，「這樣，如一則新聞來了，猛然就會想到某句話，或其中的幾個字，信手拈來，就很妥帖，運用恰到好處。」

漫談旗袍歷史與中華文化關係 廖書蘭：旗袍不止美 還看到民族自信

旗袍的華美俏麗及精巧量裁呈現了東方美，而對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新界鄉議局議員、亞洲華文作家協會香港分會會長、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廖書蘭博士而言，旗袍也寄託着她對母親的懷念，承載着她對民國人物的追思，更重要的是，旗袍使她感受到中華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如今，她更想將旗袍的歷史和文化分享給更多的人。

廖書蘭早前應邀於香港珠海學院舉辦講座《旗袍歷史與文化》，圖文並茂分享了旗袍的歷史和演變階段、與中華文化連結、韻味與鑒賞、傳承與現狀，並向在場觀眾展示了曾在香港新界鄉議局、台北、廣州、香港歷史博物館等地展覽的旗袍式樣。

對旗袍之愛源於母親

廖書蘭向觀眾們講解旗袍的故事，還動情地回憶起了自己與旗袍的不解之緣，源於身邊親人的影響，耳濡目染間，那顆喜愛與嚮往的種子自然在她心中生根發芽，今次講座她亦身穿母親留下的那件有60餘年歷史的旗袍出席，她說：「講到我的旗袍故事，一定要講我的母親，我自小是看着我母親穿旗袍長大的，記得

她除了夜晚睡覺穿睡衣以外，其餘的時間她全部是穿旗袍。記得有一次我在學校受了一些委屈，回到家見到母親，我就撲在她的身上大哭一場，之後見到母親身上那件旗袍上有我的眼淚鼻涕，原來那是我母親一件很漂亮的旗袍。我母親則沒說什麼，她將自己身上的胸口針取下，扣在我的衣服上，然後輕輕拍一拍我說，不要哭了！所以我對旗袍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機緣巧合，母親生了五個女兒，只有我能穿她的旗袍，不用修改便很合身。母親已經去世20多年，當我的皮膚和她的旗袍接觸，我總會覺得母親還在身邊。」

廖書蘭對旗袍的詳實介紹和用心分享感染了現場觀眾，講座後的答問環節，觀眾紛紛詢問關於旗袍的穿着和購買的細節，例如有學生提問：「如何在香港買到正統合體且價格相宜的

旗袍？」她回答道：「這麼多年來，常遇到一些女孩子問我，哪裏可以買到旗袍？我很樂意回答，因為只有年輕人願意去穿着，旗袍文化才會真正傳承下去。我有幾件旗袍是在裕華國貨購買，絲製的只需要1,200元港幣，有時候還會打折，比較大眾化。」作為香港珠海學院的校友，講座後她向珠海學院圖書館贈送了自己的多本圖書著作，學院代表亦向其回贈感謝紀念。



◆廖書蘭展示自己購於裕華國貨的旗袍。

◆廖書蘭向珠海學院圖書館贈書。



據了解，香港珠海學院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及建校75周年，特別舉辦中國傳統文化系列活動，加強師生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認識和理解，主題涵蓋琴、棋、書、畫和詩、袍、劍、茶八大範疇，特別邀請李美賢、楊孫西、廖書蘭、施子清、徐瑩、李春源、陳致等嘉賓舉辦相關主題講座及活動，有興趣的讀者可發送郵件至cpro@chuhai.edu.hk預留座位參加。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